



人海巴黎

RENHAIBALI

梅苑



1267/182
VE88/66

人海巴黎

梅 苑

百花文艺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63418

863418

人海巴黎

梅苑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690×980毫米 1/32 印张 6 3/4 插页 2 字数98,000

1982年1月第1版 1982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

书号: 10151·574

定价: 0.47元

凡 例

一、《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是由南开大学中文系组织编选的一套多卷本的大型文学丛书，以作家分卷，囊括“五四”运动以来一百多位著名作家的代表作。

二、本丛书包括中、短篇小说、戏剧、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文艺理论文章均不入选。

三、选录的作品既兼顾思想性和艺术性，也着眼于其历史作用，力求表现出作家的创作道路、艺术风格，同时也反映出当代文学发展的轨迹和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历史概貌。

四、选录作品一般以通行的版本为底本，注明该作品最初发表的时间和刊物，与原版本内容出入较大的，在注释中说明。

五、选录作品的编排，先按体裁分类，同类体裁的作品再按发表时间先后排列。

六、每卷除正文外，有前言和注释。《前言》对作家的生平思想和创作成就等作综合的评述，注释力求简明扼要。为使读者查阅方便，书末另附作家主要作品目录。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编委会成员

主 编 李何林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刘家鸣 李何林 张学正

张学植 张菊香 郝世峰

崔宝衡 曾广灿 蔺羨璧

前 言

胡也频（1903—1931）祖籍江西，生于福建省福州市，原名胡崇轩，幼名胡培基。1924年，与项拙等合编北京《京报》副刊《民众文艺周刊》，并在该刊上发表作品。从此，他勤于笔耕，创作了相当数量的小说、诗歌、戏剧和散文。在他生前先后结集出版的作品，计有《圣徒》、《活珠子》、《往何处去》、《诗稿》、《消磨》、《牧场上》、《三个不统一的人物》、《四星期》等短篇小说集，《一幕悲剧的写实》、《到莫斯科去》、《光明在我们的前面》等中篇小说，以及诗集《也频诗选》、戏剧集《鬼与人心》、《别人的幸福》等等。作家牺牲后，几十年来，又陆续出版了小说集《一个人的诞生》、《也频小说集》、《胡也频小说选集》、《胡也频选集》和诗集《胡也频诗稿》等等。

1924年，当胡也频涉足文坛时，正值“五卅”前夜，“苦闷彷徨的空气支配了整个文坛，即使外形上有冷观苦笑与要求享乐和麻醉的分别，但内心是同一苦闷彷徨。走向十字街头的当时的文坛只在十字街头徘徊。”（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

集·导言》)所以,在二十年代前期的文学画廊里,经常可以遇见一些苦闷彷徨着的“余零者”和“漂泊者”,这些文学形象,实际上就是徘徊于十字街头的作家本身的自我写照。投身革命之前的胡也频,也曾是这支徘徊者队伍中的一员。

前海军学校学生胡也频,一度想成为一个专门技术人材。然而,现实粉碎了他的梦。在饥饿、贫困的阴影下,“一些新的世界、古典文学、浪漫主义的生活情调与艺术气质,一天一天就侵蚀着这个孤单的流浪青年,把他极简单的脑子引向美丽的、英雄的、神奇的幻想,而且与他的现实生活并不配衬。”(丁玲:《一个真实人的一生》)同时,他那踪迹天涯的生活,造就了一个漂泊者所特有的旷达胸怀,那山川江海上的风云和雷雨使饥饿的心灵饱餐了生活的苦果。所以,当他接受文学的召唤时,他是唱着感伤与虚无的调子出现于文坛的,熟悉他经历的人都确认:这是他自己的心声。

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烈焰燃遍半个中国的时候,胡也频还没有自觉地把文学和革命联系在一起,他静静地躺在蔚蓝的海水边,倾听柔风与海浪的低吟,任汹涌的浪花翻卷着他纵横的思绪,将他十几年的坎坷遭遇和颠簸生活中的感受,凝聚成无数问号在寸心之间,他“在怀疑中思索,在思索中明悟,在朦胧中萌动的意念、理想像海云一样飞翔。”(周良沛:《一个真实人的诗》)当他还不了解革命的时候,他诅咒人生,讴歌爱情,反映时代的苦闷,倾诉幻灭的痛苦。他憎恨万恶的旧社会,他是一个用笔向旧世界复仇的人。但他却又把希望寄托于爱或虚无。

胡也频是在人生派和艺术派论争的高潮早已过去的时候开始文学创作的。这种特定情势,为胡也频提供了一个不抱偏见的客观的视角,使他有机会吸取两家之长,熔于一炉。

他那真实、坚定、务实的个性，似乎与人生派有着天然的联系，决定了他直面人生、执着现实的创作态度。所以，“……也颇本来注意于描写人生的悲苦场面，笔触不离现实。他热情，固执，勇敢地追求自己的信仰，希望一切工作都不失其意义。献身于爱情或者献身于革命事业，在他是同样的虔诚与认真。”（唐弢：《新文学的脚印》，见1948年8月5日出版的《文艺复兴》“中国文学研究专号（下）”）他的不少作品反映了旧中国愚昧、落后、野蛮、残暴等各种社会病态现象，愤怒地控诉了社会的不平、庸俗与卑下。比如像《珍珠耳坠子》、《便宜货》、《坟》等小说，直接暴露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对中国人民的蹂躏、压榨和摧残；《活珠子》、《械斗》、《他和他的家》、《两个妇人》等小说则反映了统治阶级的传统意识对广大人民的精神奴役等等。

《活珠子》、《械斗》等作品明显地带着早期“乡土文学”的特征。胡也频的这类作品，一方面鞭挞陋俗恶习的原始性、野蛮性和丑恶性；另一方面则通过下层人民对陋俗的麻木不仁，揭示出传统意识对人民群众的精神麻醉作用。比如，《活珠子》里的工匠们，因为轻信了游方道士的胡诌，认为扁形的人头里有颗神奇的“活珠子”，谁得了它，就可以富贵荣华，或修道成仙。在这种荒诞不经的迷信思想的诱惑下，两个一心想发横财的工匠，竟然谋害了一个长着扁脑袋的同伴，残忍地破开了扁脑袋，寻找“活珠子”……，这是由迷信、愚昧、贪婪、残暴所构成的一幅血淋淋的民俗画。相信“活珠子”的魔力，自然是荒唐的；为谋取“活珠子”而剖开王大保的头颅，更是惨不忍睹！然而，最最令人痛心和颤栗的是：那些和被害者王大保一起劳动的工匠们，只关心“活珠子”的下落，竟无人对王大保的惨死表示同情或哀

痛。

揭露统治阶级的精神麻醉对下层人民的严重危害，是鲁迅所开创的“乡土文学”常见的主题，胡也频的那些批判病态人生的作品，和鲁迅、和人生派作家是步调一致的。当他还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之前，他无法以明确的阶级观点来解释造成这种不合理现象的社会根源，他只是自发地反抗旧世界：“我欲举灵魂之火，烧大海成为焦土，灭绝那权威的罪恶之种类！”（《噩梦》）“喷吐那海水亦无能淹天的狂火烧掉这人间。”（《海天无限》）他早年的诗作，直接抒发了自己对人生的态度，“只有从他的诗里面才能理解他为人世困苦、冷酷、和缺少天伦之乐、缺少友谊而感到刺痛，并从而铸成了一颗坚强的心。”（丁玲：《胡也频》）在揭露和反抗不合理的人生方面，胡也频的不少小说、诗歌、戏剧都带有“为人生”的艺术倾向。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当年弥漫文坛的那种忧郁、苦闷的气氛，也毫无例外地影响了胡也频。毋庸讳言，在成为革命者之前，他也受到了忧郁、颓废的“时代病”的感染。所以，他早年的一部分作品又具有“艺术派”的“抒情小说”的韵味，在这部分作品里可以看到前期创造社对胡也频的影响。

人们曾把“五四”高潮过去之后，觉醒了青年因为找不到继续前进的道路而产生的苦闷、彷徨以及某些病态心理，称之为“时代病”。首先把“时代病”作为描写对象的是以创造社为代表的“艺术派”作家。“五卅”前后，随着前期创造社的“转向”，革命发展的新形势推动着作家们把笔触伸向更富有现实意义和时代意义的题材。胡也频正是在这样的时刻带着十几年坎坷经历的悲痛感受加入了新文学的行列。这个富有诗人气质的文学

青年没有像前期创造社的作家那样迅速地转变自己的文学观，他以一个漂泊者的特殊感受，继续在小说、诗歌和戏剧中大量地描写在苦闷的泥沼里绝望挣扎的厌世青年，真实地表现了他们在“个性解放”的口号下对封建传统意识的叛逆行为，以及他们的幻想、追求和破灭，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最终找到自己的归宿之前的曲折历程。

虽然，同是表现对旧世界的不共戴天之仇，虽然，同是表现苦闷的低诉、绝望的喊叫、痛苦的呻吟和冷漠的嘲笑，但是，胡也频作品里所描写的“时代病”与前期创造社作家所描写的“时代病”，在病根和病源上不完全相同。比如，若把郁达夫的《沉沦》和胡也频的《无题》相比较，就会发现：虽然，两者同是描写“时代病”患者的畸形心理及其悲剧性的结局（自杀），但《沉沦》主人公的苦闷，具有在社会桎梏下的思想苦闷和青春期的性苦闷的双层含意；而《无题》主人公的苦闷则是由社会压迫和生活贫困所造成，丝毫不涉及性苦闷方面的原因。一般来说，郁达夫作品中的“时代病”患者常常以性刺激来摆脱精神的苦闷；而胡也频作品中的同类人物，即使偶然撞见这种场面，也会表现出极反感的态度。

“五四”时期，几乎整整一代的新文学家都把“个性解放”作为反封建的一面战旗。胡也频也不例外。但是，与同时代作家相比，胡也频较早地认识到“个性解放”的极端发展将会走到自身的反面。他在小说《黎蒂》里批判了由“个性解放”的恶性发展而变成精神畸形儿的黎蒂。她是一个玩世不恭的颓废者，又是一个带着“世纪末”色彩的虚无者。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新女性”画廊里，黎蒂不像莎菲女士那样认真地追求纯洁的爱情和理想；也不像茅盾笔下的某些女性，把“个性解放”片面地理解为性的

解放；黎蒂要求无拘无束地表现自我、发泄感情，可是她又偏偏拒绝性刺激，并且还蔑视爱情。她的喜怒哀乐，只是远离时代风云的个人生活圈子里的一点渺小的感情风波，充其量也不过是“世纪末”的疯狂。这种消极、悲观、厌世的颓废情绪，虽然有反抗传统意识的这一面，但另一方面，却与时代潮流格格不入。当同时代的不少作家还把“个性解放”作为理想境界来仰视的时候，胡也频对黎蒂的批判态度是不容忽视的。

在《往何处去》、《一群朋友》、《黎蒂》、《杨修》等以知识分子为题材的作品里，作家淋漓尽致地抒发了那些沉沦在破灭的希望和无名的悲哀之中的青年们的忧郁感、失落感和绝望感，描写了他们被扭曲的病态心理。胡也频的生活积累为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写稿者的穷愁潦倒，编辑的辛苦和烦恼，童年的回忆，旅途的遭遇等等。小说所描写的往往是作家的亲身经历或身边琐事——饥寒交迫、孤单寂寞、冷淡的人世和求生的奋斗……。这种“自叙传”的性质和主观抒情的色彩，与前期创造社所代表的“艺术派”的“抒情小说”十分相似。

爱情题材也是胡也频早年作品的重要内容。他的这类作品，在创作倾向上深受“艺术派”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胡也频始终牢牢地把握爱情和追求性刺激、性解放之间的严格界限，他没有把爱情当作包医百病的药方。

与小说、戏剧相比，他的诗，特别是情诗，充分显示了作家的诗人气质。1981年出版的《胡也频诗稿》所收录的99首诗，线条清晰地勾勒了诗魂的轮廓。“他的诗大半是对旧社会的诅咒，充满了愤恨，即使是情诗，也不能掩盖他的悲戚。”（丁玲：《也频与革命》）是的，这是一个真实人的诗。就以情诗而论，哪一首不是以真情实感热烈地讴歌了纯洁、崇高的爱情？这些诗

“差不多每一首都是用全人格奉献给女子的谦卑心情写成的情诗”，并“以一个离奇的风格产生，在形式同感情两方面，皆与当时的所谓新诗不同”，“在当时的北方读者看来，造成了一种新的趣味。”（沈从文：《记胡也频》，1932年上海光华书局出版）有人说，爱情是文学艺术永恒的主题；另一些人则把上述观点斥之为“恋爱至上主义”。我们认为，爱情绝对不应凌驾在一切之上，但也无须把它贬斥到一切之下！古今中外，有多少青年男女，曾把爱情当作一座神秘的迷宫，对它产生过无数奇特的幻想，编织了一个又一个美妙的梦……。这似乎是许多爱情追寻者的共同经历。早年，胡也频也曾以充满激情的情诗记录了这些奇特的幻想和美妙的梦。当然，他是从一个真实的人和一個漂泊者的角度来抒发自己对爱情的“内心要求”的。

二

1927年冬天，胡也频在北京结识了共产党员冯雪峰，从中得到了许多安慰和鼓励。1928年春天，胡也频怀着朦胧的希望来到上海，先是为《中央日报》编辑《红与黑》副刊，1929年1月，凭着一腔热血，他和丁玲、沈从文办起了《红黑》月刊，他们把希望寄托在文学上，摸索前进。虽然，由于种种原因《红黑》月刊出到第八期即行停刊，但是，以文学为媒介，胡也频开始踏上新的征途。

1928到1929年，胡也频阅读了许多由鲁迅和冯雪峰翻译的苏俄文艺理论书籍，进而又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政治经济学和哲学书籍。“他对革命逐渐有了理解，逐渐左倾”。“1930年也频到济南教书，便把他刚学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传

授给他的学生们，从而得到年青人的热烈拥护。”（丁玲：《胡也频》）但是由于受到反动当局的迫害，他又不得不回到上海。

1930年5月，胡也频参加“左联”，被选为“左联”的执行委员，担任工农兵文学委员会主席。这时，胡也频仿佛重新认识了人生的意义，他自觉地使自己的文学活动服务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他说：“以前不明白为什么要写，不知道写什么，还写了那末多，现在明白了，就更该写了。”胡也频是一个光明的追求者。多年来，他一直在黑暗中摸索，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火炬使他终于找到了隧道的出口。1928到1930年间，胡也频实现了从小资产阶级立场到无产阶级立场的转变。胡也频的“转向”，典型地反映了中国现代文学从第一个十年到第二个十年的发展——从“为人生”、“为艺术”的文学观到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观的“转向”，从追求“人”的解放到表现阶级意识的觉醒；从混合型的革命文学到“普罗”文学的飞跃。

1930年5月，胡也频在为《到莫斯科去》所写的“序言”中说：“在过去——1928年以前——的革命底运动中，我们的‘文学家’大半都站在超阶级以及超世界的立场上，把现代底十分膨胀的社会诸问题当做无所关心的事件，完全忽视这阶级斗争底社会的现实。这观念的错误，是暴露了受了资本主义影响及封建残余的艺术观，以为文学家是超乎一切，而这思想，是资产阶级所特有的个人主义底生活的产物。”在这里，胡也频不仅对新文学运动第一个十年作了回顾，而且还对自己“以前的作品，也是深切地感到不满。”主动地进行自我批判。他响亮地提出创造无产阶级文学的主张：必须“完全弃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意识”，要“深入无产阶级的社会而经历他们的生活和体验他们的意识”，并热诚地期望“无产者出现于我们的文坛”。实际上，中篇小说

《到莫斯科去》的完稿（1929年5月7日），标志着胡也频开始在理论和创作两方面投入了“普罗”文学运动，虽然这部小说本身有不少缺点，但这是胡也频文学道路上的一个新的起点。所以，我们以《到莫斯科去》为分界线，把胡也频的文学活动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后期，胡也频把整个身心投入了左翼文学运动，他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理论上的积极宣传者和创作上的自觉实践者。但是，由于这个运动本身正处于幼年时期，不可避免地带有新生事物不够成熟和完善等各种弱点。当年的“革命文学”，实际上是“革命的罗曼谛克”——“革命的罗曼谛克的特征，是不能深刻的反映社会生活中的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过程，只主观的把现实的惨酷斗争，理想化，神秘化，高尚化，以至於罗曼谛克化。”（华汉：《谈谈我的创作经验》）——在这种理论的影响下，被鲁迅称之为“革命十恋爱”的所谓“革命小说”风行一时。抱着虔诚的态度投身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洪流的胡也频，自然只能以流行观念来理解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内涵。因此，他后期的作品不可能不受到“革命的罗曼谛克”思潮的侵蚀。换句话说，当年左翼文艺运动本身的各种弱点，在胡也频后期的创作中也得到了相应的反映。关于这个问题，胡也频最亲密的战友丁玲同志的意见是十分中肯的，她说：“……但我也并不喜欢胡也频转变后的小说，我常说也频，他是左倾幼稚病。”（丁玲：《一个真实人的一生》）

三

作于1929年的中篇小说《到莫斯科去》，是胡也频给“普罗”文学运动最初的献礼。

小说通过国民党反动官僚徐大齐的妻子素裳和共产党员施洵白的恋爱，描写了一个有思想、有文化教养、有社会地位的“新女性”走向革命的过程。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素裳厌恶豪华的资产阶级生活，要追求有意义的人生，一个偶然的机会，共产党员施洵白闯入了她的生活，使她在迷茫和惶惑中找到了出路，他们相爱了，素裳决定参加革命，跟施洵白到莫斯科去。正在这时，施洵白却被素裳的丈夫徐大齐捕杀，血的教训更加深了素裳对徐大齐及其所代表的旧生活的憎恶，她决心沿着那充满“无数牺牲者的红的，血的路”走下去，终于离家出走，到莫斯科去寻求真理。

作家力图用无产阶级观点去处理他所熟悉的知识分子的生活和爱情，主题是积极的。小说里的主人公也摆脱了他前期同类作品中的知识分子所常有的没落感、颓废感、狂乱感和虚无感。胡也频认真地以创作实践来表明他对“普罗”文学运动的信仰，坚定地站在革命立场上，直接反映现实生活中的革命斗争，并将爱情作为表现革命斗争和宣传革命真理的手段，这种主观愿望必须予以肯定。然而，由于《到莫斯科去》酝酿和撰写于“革命的罗曼谛克”风靡左翼文艺运动的时刻，小说实际上是按照“革命+恋爱”的模式来构思的。女主人公素裳的转变，是理想化的，具有浓重的“革命的罗曼谛克”色彩。她虽然不满于自己的现状，但这种不满并不是出于对剥削阶级寄生生活的厌恶，而是因为丈夫总是一天忙到晚，“离开她的辰光实在太多了”，“想念着她的晨光简直少极了”，“居然在生活中把她的爱情看做不什么重要了”。因此，她感到自己的生活太无聊，太孤单，太贵族化，太机械了。与洵白相遇之前，素裳早就在寻找摆脱这种“国怨”的途迳。比如，她曾觉得：“如果她是服务于社会的事业上，如

果她的时间是支配在工作中，她一定不会感到这种寂寞，和发生了这种种浅薄的感想。于是她微微叹息地想着：‘我应该有一点工作，无论什么工作都行。’”又如，她还考虑过以性解放、性刺激来摆脱寂寞无聊的生活，但没有实行，这是由于“她看不起一般男人，因为常常都觉得男人给她的刺激太薄弱了，纵然在性的方面也不能给她一点鼓励和兴趣。她认为这是她的趣味异于普通人……。”就是这个“趣味异于普通人”的新女性，在遇见共产党员施洵白之后，短短几天时间，经过几次谈话，她恋爱了，同时也找到了摆脱寂寞生活的最佳方案——投身革命！素裳的转变缺乏令人信服的生活依据，在小说的情节发展中，看不到素裳一定要与丈夫决裂并参加革命的必然性。小说本身的情节只能给读者提示这样一种思路：她之所以能够冲破反动家庭的樊笼，一心要到莫斯科去，与其说是受革命的召唤，还不如说，她是在对异性的追求中结识了一个革命者，从而促成她投奔革命。这种转变，不合乎人物性格发展的内在逻辑，在很大程度上是理想化的。小说男主人公共产党员施洵白的形象也显得比较单薄，他的高尚人格和革命情操看起来似乎是外加的，游离于性格之外，没有化为人物的血肉。他对素裳的爱情，也近乎一见钟情式的冲动。

《到莫斯科去》的“革命的罗曼谛克”的弱点，是当年“普罗”作品的通病，正如茅盾在批评阳翰笙（华汉）的《地泉》时所说的那样：“革命的罗曼谛克”在当年，“不是单独的，个人的，而实是1928年到1930年间大多数（或竟不妨说是全体）此类作品的一般的倾向。”（见茅盾为《地泉》作的“序”）因此，若把胡也频后期的作品置于中国左翼文学运动发生发展的历史总背景中去考察，他后期创作上的得失，与其说是他个人的成败，还不如说是整个左翼文艺运动的历史功绩及其历史局限性在具体

作家身上的反映。

四

1930年写成的中篇小说《光明在我们的前面》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宝贵的财富之一。这部作品以一对青年的恋爱生活为线索，表现了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两种思潮的尖锐冲突，提出了中国革命的道路和前途问题。男主人公刘希坚是一个政治上比较成熟的共产党员，他的爱人白华则是无政府主义的信徒。他们各自都坚信自己的政治主张是改革中国社会的指南，他们在一起时，都全力维护自己的信仰，并力图说服对方。因此，这一对在爱情上相互倾慕而在信仰上水火不容的恋人，每次见面几乎都要经过一个三部曲的公式：开始是欢喜地握手，中间是激烈的争执，最后是喜剧的煞尾——谁也没有说服谁。怎样来解决这种信仰和爱情的尖锐矛盾呢？习惯的俗套是依靠爱情的魔力。然而，撰写《光明在我们的前面》时的胡也频，已经不同于写《到莫斯科去》时的胡也频了，他没有借用爱情的力量，而是以伟大的历史性事件“五卅”运动为契机，把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同时置于革命熔炉之中，让实践这杆天平来公正地掂量各种主义和党派的政治份量。“五卅”的风暴充分显示了只有马克思主义政党才能肩负领导革命运动的责任，共产党人有计划地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站在斗争的最前列，生动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而产生巨大威力，而无政府主义者在“五卅”运动中的一系列表现则充分暴露了他们极端个人主义和极端自由主义的反动面目。女主人公白华在事实的启发和教育下，终于认识到安那其的个人主义自由行动是不能肩负时代的使命的。白华的转变有坚